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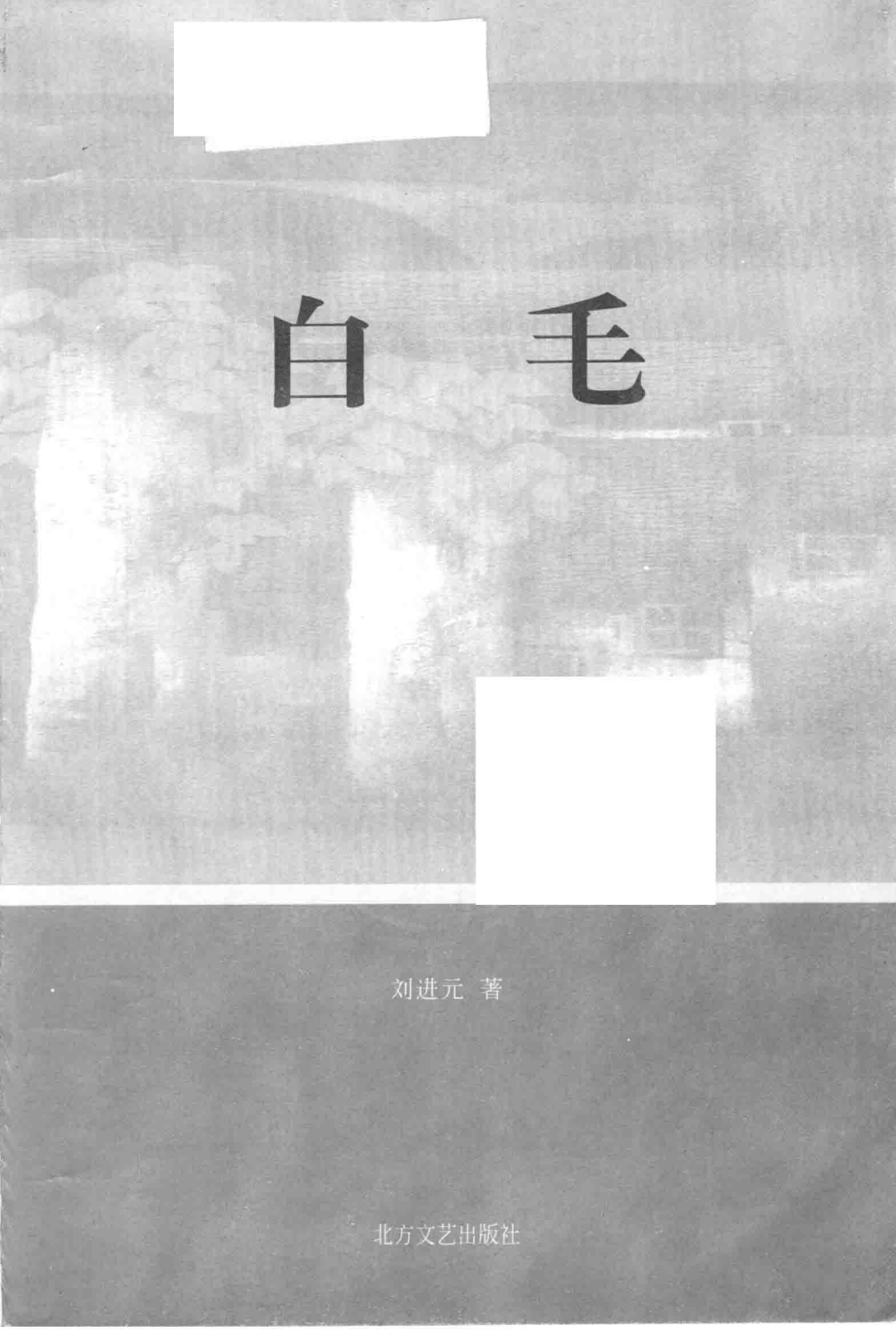
B A I M A O

白毛

刘进元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白 毛

刘进元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马合省
创意策划：马合省
封面设计：安 璐

白 毛

Bai Mao

刘进元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75 字数 300 千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 000

ISBN 7-5317-1202-4/I·1145 定价：19.80 元

目 录

没有风浪的护城河·····	1
从 良 ·····	75
白 毛·····	141
荒凉友情·····	193
愚鲁之辈·····	235
一路上春雨绵绵·····	273
初恋不是飘逝的白云·····	287
坛根儿的人·····	298
费话闲情·····	308
非虚构小说(十八题)·····	316
有个马车夫·····	356
山丁子·····	372
二嫂子·····	389
后 记·····	403

没有风浪的护城河

1

上午，伯平带着女儿去母亲家。

说来也怪，三十多岁了，他好像比以前更加依恋母亲。虽然自己有家，环境和条件都挺好，但他每个星期总要去母亲那儿两三次。哪怕只是看母亲一眼，说几句话也好。在母亲身边，他又像小时候那样，感到温暖和安全。

好像要下雪。东南风带着些假惺惺的暖意，从护城河对岸吹来，夹裹着一阵火车的轰鸣声。河槽很深，风吹不到水面，河在缓缓地流动，没有一丝波纹。铅色的云映在水里，平常明亮如镜的水面显得暗淡了。这段护城河大概有四百年的历史。据记载，北京的永定门建于明朝的嘉靖年间，那么，永定门外的这一段护城河也一定是同一时期开掘的。几百年过去了，除去紫禁城和东便门附近的一段城墙以外，北京的城墙已陆续拆除。永定门城门以及东西两侧的城墙也早就没有了。可这段护城河还在，春夏秋冬，河水长流不断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护城河在军事上的意义几乎等于零，可既然存留在这个世界上，就得起点儿作用，它负起排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的责任。细一琢磨，这护城河简直功德无量。您想啊，要是没有它源源不断地把那些污水送到老远的地方去，北京城非臭了不可！有些淑女雅士对护城河常常嗤之以鼻：臭劲儿的！可他不好好闻一闻，这河水里也有自己的味儿呢。自打拆城墙到现在，河两岸，特别是靠城里这边起了不小的变化。沿着护

城河往东，一片新建的楼房代替了空旷的野地，也挡住了六十年代盖的那些像受气媳妇似的简易楼。这样的格局就好像贴身穿开了线的背心，而外面却罩着混纺毛料制服。不错，是制服，那些楼都是一个样儿。河边上，垂柳依依，杨树高耸。柏树墙圈成一个个花圃，连翘、玫瑰和丁香与四季常青的侧柏为伴。花圃两侧各有一条柏油路，宽的跑车，窄的走人。春夏秋三季，人们彳亍河边，流连在树荫下，赏花，聊天，打扑克，下棋，遛鸟儿，谈恋爱，天一黑下来，还能偷着亲个嘴什么的……可真是个好去处。

倒退些年头，城根底下可不是这个模样。残墙颓垣，荒草野树，跟紫禁城的城根一比，透着股子野劲儿和穷气。

现在是冬天，光秃秃的柳树枝悬在半空，像一根根鞭子，小风一刮，把人都给抽没了。

妻子本融上班了，伯平带着五岁的女儿走在这条路上。他没骑车，也没坐汽车，特意要走一走这条路，好从记忆中捡回些什么。今天是父亲的忌日，全家人团聚，这是母亲订下的规矩。每到这一天，伯平都要想起不少往事：父亲的、母亲的、自己的，还有老街坊们的。

东南风像只软和的小手在轻轻地推着后腰。

“爸爸，”女儿指着脚下，“这儿，从前是城墙吗？”

“是城墙。”

“城墙高吗？”

“高。”

“好玩吗？”

“好玩。爸爸小时候天天爬城墙玩。”

女儿抬头向上看去，大概是想看看城墙吧，可什么也没看见，便大人似的轻轻叹了口气。

伯平觉得，城墙拆得没有道理。北京是座古城，可现在除去故宫、北海、天坛和幸免于厄运的钟鼓楼、正阳门、德胜门、观

象台外，已经不怎么“古”了。今年夏天，他在辽宁兴城，有一天和几个朋友拿着记者证，登了古城的城头。看着正在兴建的“明朝一条街”，看着祖氏牌坊和城中央的钟鼓楼，他觉得气派太小了，就想，北京的城门和城墙要是不拆，比这个小城岂不气派百倍！

老北京的城门城墙，那是什么气势！

永定门在北京南北中轴线的最南端。北面五里以外，正对着正阳门，也就是前门。建筑形式跟正阳门相仿佛，巍峨高大，老话说有九丈九高。三层飞檐，两层城楼，顶上铺着灰瓦，绿琉璃瓦镶着檐边，跟王府一样的待遇。梁柱是朱红色的，由于年久失修，都已油漆剥落……当年，它老人家还健在的时候，除去冬天，每到晚傍晚，成千上万只燕子和蝙蝠在城门楼四周的上空叫着，飞着，绕来绕去，衬着五彩斑斓的晚霞，给老北京罩着一层神秘庄严的气氛。在这种氛围里，你不得不承认，城门楼子本身就是一种灿烂的文化。

据老人们说，刘伯温当年修北京的时候，把北京城设计成一个头朝南、脚冲北的人形。前门是脑袋，宣武门和崇文门是两只手，东直门和西直门是两只脚，皇宫里的那些建筑则是五脏六腑，至于后门和鼓楼钟楼是什么，不好说，你就想像去吧。那么，永定门是什么呢？老人们也不知道。因为北京的南外城——永定门、左安门、右安门等，修得要晚些年头，大约跟“人”没多大关系了。近年，据伯平的一位朋友在小说里分析，南外城就像北京城的一顶帽子。不错，是像顶帽子，古老的南城帽儿。

永定门就是这帽子的顶部。

……七八岁的伯平手抠着砖缝往城墙上爬。城门旁有一条马道通向城头，可他从不走马道，觉得从马道上城墙没劲。爬上去，多棒！爬到半截，千万不能朝下看，要不，头一晕，心里一含糊，非摔下去不可！扎针灸的冯六的小儿子有一回就这么摔下去了，半

天没缓上气来。那孩子长大以后有点儿傻，虽说是往里傻，不往外傻，但终归还是有点儿傻——跟那一摔很有些关系。

城墙上铺的砖早已被人挖得凌乱不堪。城头上长满了野草和酸枣棵子。一帮孩子在城墙上疯啊，跑啊，在野草里钻来钻去，满世界掐摸半红半黄的酸枣。为了摘一颗小酸枣，手被酸枣刺扎得直流血。摘下酸枣，往嘴里一扔，上下牙一碰嘎嘣脆！酸枣棵上还有螳螂蛋，据冯六说，这玩艺儿能治尿炕。伯平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吃过不少，骚气哄哄的。然而，却总不见什么效果，每天早上，母亲还是要把他的褥子搭到院里的绳子上晾。伯平私下以为那是吃的还不够量。

城里这块儿，从天坛南墙和西墙到城墙之间有一块空旷的野地（也就是现在楼群和大马路的所在），与西边的先农坛毗邻相对。大家管先农坛叫西坛，管这块野地叫东坛。解放前，东坛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临时飞机场，飞机起飞时，这一带民房上就弄得满是黄土。北平和平解放以后，飞机场没用了，长满了荒草，成为蚂蚱、蜻蜓和蝴蝶起飞降落的地方。有一阵儿，东坛的最里面当过靶场，常能听见机枪哒哒地响。伯平跟光启、虎印几个孩子一块儿到黄土堆里挖过子弹头，捡过子弹壳。弹壳留着玩，弹头化成铅，卖了。所卖的钱买冰棍吃，都是三分一根，红果的。以后，这里还训练过国庆时受检阅的坦克。靠城墙的一边，造过一座简易的检阅台，有人说，彭德怀元帅来检阅过坦克。如果有这事，那该是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前。一九五八年，东坛还驻过回国的志愿军，到处搭着绿帐篷。后来这里又成了果品公司潞柿子和堆放水果的好地方。那时，正闹“三年灾害”，柿子和伊拉克蜜枣使许多孩子少挨了不少饿。果品公司撤退了，有人又想起了植树造林。一片新树林拔地而起，充满了成材的希望。每到盛夏，学生们就钻到林荫下复习功课。伯平也拿着书到树林里来过，却是到处扔土坷垃，给复习功课的人捣乱。人口爆炸，北京的住房日益紧张，树

木又在眨眼之间被毁掉，盖了些简易楼……东坛这二三十年的变化，真可谓沧海桑田。

城外，离城根两丈远，就是护城河。那时的河槽，没有现在这么宽，也没有这么深。河水也浅，有些地方，垫一溜儿石头，歪歪扭扭走过去，不湿鞋。一下大雨，城里下水道的水奔涌而来，河水就涨了。伯平、光启、虎印他们光着屁股往河里一蹦，蛙式、狗刨，闹得原本在河里美滋滋的鸭子们赶紧上了岸，冲他们嘎嘎叫着翻白眼。北岸坡上，老榆树高大威风。每到春天，伯平他们就光着脚，爬上树去，撸青嫩的榆钱儿吃。吃得满嘴又绿又黑，小肚子溜圆。这也好，给家里省粮食了。南岸坡上是菜地，也种点儿玉米什么的。玩来劲了，一帮孩子就游过河去，爬上岸，到菜地里拔几个萝卜，撅几根甜秆。待看菜地的人发现，追将过来，他们就跳下河，游回北岸，爬上城墙，骑在城垛子上，嚼着萝卜甜秆，嘴里还骂骂咧咧地气人玩。

顺着坛根和城根有一条土路，马车来往不断。孩子常站在城墙上淘气，等马车即将拐弯时，就大声问：“谁是我儿子？”这时，车把式嘴里正吆喝着：“哦（我）！哦（我）！哦（我）！”孩子们哈哈大笑，车把式破口大骂……

城墙、护城河、东坛，是伯平小时候的乐土。除去上学、吃饭和睡觉以外，其他时间都是在这三个地方消磨的。现在，他身上有股子“野气”，一定是跟这些地方有关系。

每当天快黑的时候，几乎同时，一片叫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响彻城墙内外。

“光启——”

“虎印——”

“伯平——”

母亲在叫了。伯平他们带着一身泥土，一身汗水，走在母亲的身边……

“爸爸，”女儿在问，“你管奶奶叫妈妈，对吗？”

“对。”伯平摸着女儿的头，答应着。马上，他又在心里更正：不是叫“妈妈”，而是叫“妈”。这个“妈”字，应该念成 māi。永定门城根底下的孩子，那时都这么叫。比如：大 māi，姑 māi。现在，他已经不管母亲叫 māi 了，而是叫妈。他注意过，大家都不 māi、māi 的了，也许这是城根底下的人们向文明靠拢的一种表示吧。虽然文明了，但伯平从没管母亲叫过“妈妈”。他觉得那么叫，多少带点儿洋味儿，不太习惯。

母亲六十四岁了，头发有些花白，半身不遂，行动多有不便。老人家呀，一辈子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！现在，一定又拖着不方便的身子忙上了。孙男娣女拢到一块儿，老人家忙点儿，心甘情愿。别让母亲等着急，伯平拉着女儿快步走过来。

身边的护城河默默无言，好像根本没有流动一样。伯平走着走着，不觉轻轻摇了一下头，今天母亲又得跟自己怄点儿气，保险。几年来，每逢父亲的忌日，都是如此。唉，没办法！

脸上感到一丝凉意。伯平这才注意到，细碎的雪花，已经在半空中稀稀落落地飞舞了。

2

母亲左手提着一个装有四个奶瓶的塑料小篮，拖着半身不遂的身子走出院门。细碎的雪花刚落到地上就化了，胡同里一片潮湿。母亲微拐着右腿向北慢慢走，胡同的北头是牛奶站。

这条胡同叫东坛根，形状像拐着直角的胳膊弯儿。出南口就是护城河。原先有城墙的时候，出口向西一拐就能上城墙的马道。现在城墙拆了，站在胡同口能看见护城河对岸的树木和农贸市场。顺着漫坡儿，胡同到北头以后，又折向西边，出口是永定门大街。这一片民房很不齐整，据说，最早的房产权是军阀吴佩孚的一个

亲戚兼副官的。这样看来，东坛根的历史只能从民国的时候算起。不错，这胡同的历史并不古老，连光绪年间刊印的《京师坊巷志稿》上都没有它。几十个院子，几乎都是同一式样不规则的小杂院。起脊的院门里，住着十来户人家。早年，南北房青砖到顶，铺着巴掌大的灰瓦；东西房则大多是黄泥墙上刷着一层青灰，房顶也是平的，没有瓦。近些年，东西房拆了，在原地基上又盖成了清一色的红砖洋灰瓦的新房。比起那些整砖里包着碎砖头和黄土的南北正房来，东西偏房倒显得阔气了一些。爱开玩笑的胡胖子说，这跟人一样，偏房比正房可人疼！

五六年前，胡同的泥土路换成了柏油路。母亲正慢慢地走在这一柏油路面上，同过往的街坊们打着招呼。取牛奶，是母亲每天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。同院的赵大妈一条腿摔断了两回，瘫在床上不能动弹。傅婶早起就到天桥百货商场门口摆茶摊儿去了。几家的孙子孙女都是日托，晚上要喝牛奶，儿子媳妇们都上班，忙，取牛奶的事就由母亲包了下来。街里街坊的，哪个能没有病呀灾儿的，没有个大事小情的，相处三十年了，谁不得帮谁一把呢！

早上，傅婶推着装茶杯水壶的小车在院里碰到母亲，说：“刘嫂，又忙上啦？”

“啊，出摊儿呀。”母亲要到水管子接壶水，跟老姐妹打着招呼。“他傅婶，甭看你大我好几岁，身子骨可真硬朗！奔七十了，还天天出摊儿。”

“挣命呗！”傅婶一绷脸，接着又笑了，满脸都是纵横交错的皱纹。“我这是命不好，当年大松心活着的时候，一辈子不正经干，不顾家。我能怎么着？手笨，也学不会别的。为拉扯这帮孩子，摆了茶摊儿。这倒好，一摆，快三十年了。”

大松心是傅婶的丈夫，死去十年了。

“还是你身体好。老了，图什么？没病没灾儿，硬硬朗朗的。像我，”母亲晃着身体，甩了甩不能活动的右胳膊，“让人烦！”

“瞧您说的！儿子闺女都孝顺，媳妇也不错，您还要怎么着？就说伯平那小子吧，小时候淘出圈儿去了，现在，记者啦！也怪，上学那时候，也没见他用功，这学问从哪儿来的！”傅婶是个爱聊天的人，几十年饱经忧患，使她变成了一个豁达的老太太。

“收入还可以吧？”母亲不喜欢自己夸奖儿女们，就转移了话题。

“凑合呗。”傅婶掏出一颗烟，点着，抽了一口，说，“这二年，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人都有钱了。渴了，喝汽水、酸奶，还有什么可口可乐，谁还喝大碗茶呀？过去二分一碗，现在三分了。就这么调整，也挣不了多少！”傅婶觉得“调整”这个词儿用得恰到好处，咧着没牙的嘴笑了。

“您那也能叫调整？差远了！您瞧那鱼、肉，还有菜，吓人！”一说起物价，母亲总有些愤愤然。可她心里有个大谱儿，一是国家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，把老百姓扔一边不管；二是买不起贵的，就买贱的，黄瓜西红柿吃不起，那就多吃点儿萝卜大白菜呗。因此，刚生上来的气又马上消了一半，说，“够自己花的就行了。”

“那倒是。”傅婶也知足，“刘嫂，麻烦您见天给取牛奶。”

“每天这么说，您也不嫌烦！”母亲嗔怪地说。

“客气客气，好让您每天都给取呀！”傅婶开了句玩笑，推着小车走了几步，又回过头来说：“刘嫂，今天是刘大哥的忌日，收摊儿我过您屋里看看。”

母亲不由得叹了口气，走到水管子旁边，把水壶放到水池子里，拧开了龙头。他傅婶可真是个好心人，今天这个日子她还记着。人好命苦，嫁给大松心，累了一辈子。这个大松心哪……

大松心也就是傅叔。老傅家是满族正黄旗，家里有清朝皇帝赐的一根黄带子，杀人不偿命。他们不该姓傅，而应该姓富才对，满族人嘛。大松心的父亲秀二爷，当年在正阳门底下看观音庙，常跟原来宫里的人来往。香火盛时，印度、尼泊尔来的香客常常光

顾观音庙，秀二爷本是有些钱的。大松心是独生儿子，秀二爷供他念了高等英文学校，盼着他能有个出息。谁曾想，解放后，挺好的铁路局翻译的事由不干了，去扳了道岔。后来嫌累，又到铁路医院去喂了兔子。再以后干脆辞了公职，蹬三轮、干临时工，拿个“唤头”，夹个白布包袱皮儿，到乡下去给农民剃头。还嫌累，还嫌不滋润，最后竟卖了血。家里六个孩子，他一百八十个松心，不管不问，把个家扔给了傅婶。打公私合营那年开始，傅婶就开始摆茶摊儿，供孩子们上学、吃饭、穿衣。可真够她受的！现如今快七十岁的人了，还每天出摊儿。劝她别去了，她说：“惯了。商场门口人多，不图挣俩钱儿，图个热闹，省得闲出病来。”

母亲取牛奶不用排队，奶站的人照顾她半身不遂。取回牛奶，母亲先给住在西屋的赵大妈送去。

因为房檐下接出的小厨房挡住亮光，赵大妈的屋里很暗。母亲进门后，首先看到的是硬木条案上摆的一对青花掸瓶。这是古物，清朝道光年间的东西。靠西墙正中戳着个奶黄色的大衣柜，穿衣镜的质量不怎么好，照在里面的东西都有些走形。母亲记得，一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前，放大衣柜的这西墙上挂的是一幅关帝像。关平和周仓侍立两旁，红脸的关帝爷端坐中央，一手捋着五绺长髯，一手托着一本书。据关帝爷的忠实崇拜者赵大爷说，那本书是《春秋》。可惜这个老好人也死了。现在，赵大妈就在正对着大衣柜的单人床上半靠半坐着。

一见母亲进来，赵大妈忙欠起身来，说：“刘嫂，您把奶放下，先喝口水。”赵大妈常年关在屋里出不去，脸色煞白，原本胖胖的脸上，皮肉已经松弛了，顺着两腮耷拉下来。花白的头发蓬松着，像一堆乱草。母亲知道，她的老儿媳每天都要给她梳头，可她不让，婆媳俩总为这点儿事闹气。唉，早先赵大妈可不这样，黑黑的头发总是用篦子抿得紧紧的，油光溜滑。那时，她可是个争强好胜的主儿，就是太厉害了点儿。

母亲把一瓶牛奶放在条案上，又转身走到炉子旁，打开炉盖，看火有些乏了，就用铁夹子夹起一块蜂窝煤添进炉膛，然后说：“赵嫂，不冷吧？有事儿您言语一声，我先回去了。”

“刘嫂，您先别走，我跟您说句话儿。”赵大妈见天就这么坐着，觉得寂寞，总想找人说点儿什么，聊聊天。母亲能体会这种心情，就停住刚迈出去的脚步，却也没坐下，站在原地。

“这几年，我也动不了窝，弄不明白外边都是怎么了。”赵大妈混浊的眼睛开始放出光来。“就说我们家那个小骚鞑子吧，昨儿不知道从哪鼓捣来一条劳动布的裤子，紧包着屁股，上面还缀着一个铜牌子，晃过来晃过去的，也他妈不嫌臊得慌！”

“那叫牛仔裤，时兴，年轻人净穿这种裤子的。”母亲知道赵家婆媳不和，忙笑着说。

“噢，这就叫牛仔裤呀，老听人说，我原来还以为是放牛的穿的哪！门口那家不就是在小摊儿捣腾这玩艺儿吗？真坑人！这种裤子，男的穿也罢了，女的，绷着个屁股，那不是浪么！”赵大妈有点儿咬牙切齿了。

“赵嫂，话不能这么说。”母亲摆摆手，“穿着打扮虽然是各人所好，可也不一准就能说这人怎么样怎么样。看人，还是看行事儿，看根儿。我看光启媳妇不错，人挺本分。跟您说点儿新鲜事儿。夏天，我跟孩子们去了趟北海，看见人家那些外国老太太，比咱们岁数都大，可还穿着花衣裳花裙子，也挺顺眼的。话又说回来，要是让咱们也穿上那身行头，那还不成老妖精啦！”

赵大妈笑了，说：“您可真会逗乐儿。可不管怎么说，我看不惯那个。”

“看不惯，就装看不见。”母亲说，“眼不见，心不烦。别生气了，我回去了。”

刚把傅婶家的那瓶牛奶放到窗台上，母亲就听见身后传来欢快的叫声，“奶奶！”

母亲转过身，脸上笑开了花：“我孙女来了，今天怎么没上托儿所？”

伯平走上前，接过母亲手里的塑料小篮，说：“我今天请假了，孩子也没送。”

母亲点点头，领着孙女向自己家里走去。

3

上午，家里没什么活儿，母亲要带着孙女去河边的农贸市场买点儿菜，预备晚上大家都回来好吃。伯平要去，母亲说不用，我得活动活动身子。伯平一想也是，就站在房门前打量起院子来。

院子变小了，空间越来越窄。像许多老北京人一样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孩子们早已长大，成家立业了，可住房还是以前那么点儿。无奈，大家便自力更生，动手在房檐下接小屋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还只是搭个小棚子，当厨房用。闹地震以后，逐渐发展到盖正式的砖瓦房，比原来的房子还好。在里面住人，娶媳妇，生孩子。原来挺宽敞的院子成了曲里拐弯的小胡同。即使这样，大家住得还是挺紧巴。伯平弄不明白，什么时候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才能解决。按说，粉碎“四人帮”以来，北京盖了不少楼，什么团结湖、劲松，一大片一大片的，名儿也不错。可是，除去拆迁户以外，有多少真正住房最紧张的平头百姓搬进了新楼了呢？当然有，但不多。他住的那栋楼里，有一半左右的房子有主儿，也交房钱，可几年来从没有住过人。他家对面的那套三居室，登记的户主竟是一个刚刚七岁的孩子！伯平想，这种事情，应该让领导者们好好想一想，处理一下。他曾跟母亲说过这件事。

母亲却说：“你呀，白活三十多岁，这点儿人情事理都不懂！能分到房子又不去住的，必是家里有困难！咱们得体谅人家。”

“有什么困难？”伯平不明白，怎么分了房子又不去住倒成了

“困难”。

“腾不出人呗！你想，让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住三大门，他家里爷爷奶奶能放心吗？”

母亲有一种机智的幽默感，有时连爱耍贫嘴的伯平都自愧弗如。伯平觉得，这二三十年，国家大事小事不断线，一会儿上吐，一会儿下泻，像母亲这样的一代人能拉扯着一帮孩子熬过来，除去坚强以外，恐怕还要依靠这种幽默和欢乐吧。

现在想起来，那一定是一九五七年的事。一天晚上，伯平跟几个小伙伴在东坛里疯跑了一下午，天擦黑才回到家里。吃饭的时候，父亲对母亲说：“我说，”母亲有名有姓，可父亲却从来都管母亲叫“我说”。伯平觉得挺有意思，因为，在他的心目中，父亲是个读书人，跟院里的其他街坊不一样，可是，在家里却从来不像别的院里的那些读书人，管妻子叫“淑娴”“凤娟”什么的。父亲说，“我说，单位号召大家给领导提意见，让大鸣大放，找我谈了好几次，你说我提不提呢？”

“不提。”母亲答得干脆利落，“自来都是不打听话的孩子。提什么意见呀？”

“可这是号召！”父亲虽然有点儿历史问题，却十分要求进步，总是响应号召。他又说，“再说，我对张主任也确实有意见，不懂的事瞎指挥，还净吹胡子瞪眼的。”父亲放下饭碗，很认真的样子。

“那就更不能提了。”母亲吃了一口菜，“有的人就是不懂装懂，刘宝瑞的单口相声《假行家》听过没有？就那样儿。可你要是一给提出来，非坏事不可！你想人家脸上挂得住吗？”

“对工作有利嘛。”

“有利也不行。”母亲也放下饭碗，“上个月，我看你兜破了，要给你缝一缝。你说什么来着？别净没事找事，制服兜在里面，别人又看不见，缝它干什么！结果怎么样，当天发工资，七十块钱一分没剩，全丢了！”

“我是说给领导提意见，你扯这些干什么？”父亲一想起这事就觉得窝囊。

“我这就是说给领导提意见啊。你在家是领导不是？一家之主！丢了钱，我给你提意见，说那兜要是让我缝上就没这事了，对过日子有利没利？你怎么着？发多大火，就差没砸水缸了，倒好像是我把钱丢了似的。”

父亲不说话了。

母亲接着说：“将小比大，单位和家里一个样，谁有权谁就对，谁就什么都懂。我可跟你说，不许给领导提意见！咱们既不拍马屁，又不提意见。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家里还有好几个孩子呢。”

虽然当时父亲说了一句“女人见识”，可在单位真的一言未发，没提意见。到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后，父亲吓得面色如土，一个劲儿说母亲“英明”。

母亲说：“我英明什么呀？女人见识罢了。倒是领导英明，先做个套，让你钻……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今天你喝口酒，压压惊。”

母亲是家里消灾去祸的福星。不过，不要以为母亲那时一点儿也不害怕，她是不愿在胆小的父亲面前显露出来。有一天，母亲下班回家，因为下雨没有出摊儿的傅婶过来串门，俩人就聊开了。

傅婶说：“头条二号耿家的男人，就是天坛医院当药房主任的那位，右派啦！您说说，没见他给谁成心拿错过药啊，见人说话也挺和气的，怎么就右派了呢？见天扫地哪！”

母亲叹了口气，两眼有些茫然。

傅婶接着说：“三条张家那位，三脚踹不出个屁来，连句话都不说的主儿，辞职啦……”

“怎么辞职了？那他们家指着什么过呀？”母亲非常关心。

“吓的！听四爷说，开会斗争右派，一喊口号，她这侄子的裤子就湿了，第二天找领导辞了职，说什么也不上班了。他们家